

惠棟训诂研究



钱慧真 著

南京师范大学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吴三惠训诂研究」(12YYC013) 结项成果
江苏省「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惠栋训诂研究

钱慧真 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惠栋训诂研究 / 钱慧真著.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651-3661-0

I. ①惠… II. ①钱… III. ①训诂—研究 IV.
①H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2695 号

-
- 书 名 惠栋训诂研究
著 者 钱慧真
责任编辑 崔 兰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西村 9 号(邮编:210016)
电 话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印 刷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3661-0
定 价 59.00 元
- 出 版 人 彭志斌
-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言及清代学术史，绕不开“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学术领域逐渐发展成熟的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式的学术流派。因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一反宋明以来注重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承继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所以称为“汉学”，又因这一学派提倡“实事求是”，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故又有“朴学”之称。

自江藩到章太炎、梁启超，学界又将“乾嘉学派”分为两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的“吴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的“皖派”。

如果仅从地域特点、学术取向而言：“吴派”的惠栋等人注重对六经的注疏，特别是在《易》《书》的考据上成就甚大；“皖派”的戴震等人则更重视以小学求义理，在小学本身有更大的建树。惠派重视“博闻强记”“信古尊汉”和戴派“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的区别也显而易见。从这一角度看，将他们分为“各成一家之言”的两个学派亦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我们将吴、皖两派看成殊死争锋、势不两立的派别，甚至一味“扬戴抑惠”，则失却了学术评价上的公允，不符合科学的精神。

记得陈祖武先生在《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中指出：戴震的学问受惠栋影响甚大，划分吴、皖则抹杀了考据学的发展过程；且吴、皖的治学宗旨和基本方法都是文字训诂，以考据文字求义理，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又进一步指出：所谓吴、皖两派的特点主要是惠栋、戴震两人的特点，而非整体的特点，相反在这种学派划分方法下，有很多被归为一派的学者反而表现出通常所认为的另外一派的特点。张舜徽先生在分析乾嘉吴、皖、扬三派学术异

同时也指出：“余尝考论乾嘉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两位先生的评价深得我心。我也一直期盼有学者能秉持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实际材料出发，结合时代背景、师承关系、理念方法，分别对吴、皖两派的学术传承、学术特色、学术贡献、学术影响及各自的不足作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

不久，这一机缘就来了。2005年9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徐道彬博士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随我进行研究工作，他的博士论文是煌煌50万字的《戴震考据学研究》，如今他从安徽来到江苏，于是我建议他的博士后研究选题为“乾嘉时期苏皖地区考据学风研究”，想将他的研究从仅言皖、戴，拉到兼及苏、惠。这一研究很快得到了国家博士后研究基金的资助，两年以后，研究报告得以“优秀”通过。

2009年9月，钱慧真博士从山东大学毕业，亦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随我进行研究工作，因为她博士阶段随导师徐超教授专攻传统训诂学，因此，便愉快地选择了“惠栋训诂研究”的课题。课题虽是定了下来，但困难也随之而来。首先，学界长期以来因“扬戴抑惠”的某些成见，以往对惠栋的学术成果研究甚少，且不深入。故这一研究几乎是白手起家，缺少依傍。其次，惠栋及吴派的训诂成果大多散见于随文注疏，且卷帙繁多，必须逐一研读爬梳。而且要做到对惠栋的训诂成就的评价不致偏颇，必须与皖派的训诂成就进行比较，这又无形中增加不少的工作量。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慧真娇小的身体中蕴藏着无尽的能量，她从此一头扑进图书馆、资料室，经过两年700多个日夜的焚膏继晷，终于如期完成了10多万字的出站报告《惠栋训诂研究》，并且结合研究课题，撰写了11篇论文，其中9篇都已在学术刊物上刊出（2篇二级权威，5篇CSSCI期刊，1篇核心期刊，1

篇专业类辑刊)。这样的高产在历年博士后中是比较突出的,这充分说明了慧真在学术研究上的努力与执着。也正因为此,博士后一出站,便被留在了南师大国际文化教育学院任教。

踏上新的工作岗位,慧真为了适应国际文化教育学院的学科特点,又申报到了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朝鲜使者汉文著述词汇研究”,加上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刚有一个嗷嗷待哺的幼儿,可以说科研、教学、家庭压力都巨大。但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停止对惠栋训诂研究的步伐,而是不断进行着拓展深化。由于该项研究为江苏训诂学家研究之一,紧密结合了江苏省地方文化研究,后来又得到了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的资助,这为研究的持续提供了极大帮助。从2009年开始,到2018年止,经前后10年时间的逐步扩充、反复打磨,慧真才将书稿交出版社,足见其治学态度之认真。所以当她将20多万字的《惠栋训诂研究》书稿交给我,向我索序,我是无法推委的。

读罢全部书稿,深感这是一部严谨踏实且很有特色的学术史论著。其主要特色有六。

一是考镜学术源流。书稿从惠栋训诂的学术渊源入手,对吴门惠氏家学传承和江苏训诂世家进行了仔细梳理,指出惠栋的训诂取向的形成,渊源深广:惠栋之祖惠周惕在训诂中使用“以《易》说《诗》”“以史证《诗》、以《诗》证史”的方法,奠定了惠氏家族“易学”“春秋学”研究的基础;“谙知天文历法”“以铜器铭文证古文字”又构建了惠氏家族训诂研究的知识结构。惠栋之父惠士奇的“春秋学”“易学”在传承家学的基础上,也直接影响到惠栋的经学训诂取向及研究方法。另外,清代江苏一地除了惠氏家族,还有诸多类似的家族。该书对18家训诂世家进行了研究,这些训诂世家的家学内容涉及《周易》《论语》《春秋》《尚书》等各个方面。这些训诂世家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延伸,就发展

成了众多以研究经学为主体的地域性学派,而江苏境内的吴派,就是以惠氏家族为中心而形成的学派。

二是理清原始著述。惠栋的著述是研究惠栋训诂的第一手材料。因此理清、鉴别惠栋的著述必然成为研究的首要工作。书稿对惠栋的著作类型进行了详尽统计与考辨。不仅调查了惠氏 26 种刊刻著作的版本类型,还摸清了 16 种稿本和抄本的内容和馆藏情况,并将调查考辨结果以表格的形式附于书稿之后,让读者一目了然。其间,还从文献学的视野,以敏锐的目光纠正了旧录为惠栋所撰著作的两处讹误:《惠氏读说文记》旧录惠栋作,但经考证,其作者当为惠士奇、惠栋父子,而非惠栋一人;《左传补注》旧说为《九经古义》一种,先有四卷,后又增益两卷,最后才独立成书,但据考证,四卷、六卷本只是分法不同,内容上并无增减,且它一直是单独成书,而非《九经古义》之一种。对惠栋原始著作的理清,为研究材料的可靠性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分析训诂内容。通过对惠栋散见于各书中的训诂内容的收集分析,发现惠栋对于汉注也多有驳斥,时见驳斥汉儒用字之误或释词之误;而对于魏晋以后的注释成果也多有吸取。书稿中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学界对惠栋“凡汉皆好”“不问真不真,唯问汉不汉”的批评有失偏颇。惠氏虽然尊信汉儒,但他在取舍之际并非一味墨守;他虽辩驳魏晋以降有些训释不合古义,但在实践中亦非全盘逐黜。概言之,惠栋的训诂实践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博采众说而有所裁断,既征汉尊古而又驳汉求实,而非前人所说的“唯汉是从”。

四是归纳训诂方法。书稿首次对惠栋的训诂方法从哲学、逻辑学、语言学三个层面进行总结归纳,并着重提炼出惠栋语言学层面的三种训诂方法:1. 异文考证法。惠栋在训诂中善于利用版本异文、引书异文、他书异文来沟通字际关系、比勘经文、解

词释义。2. 因声求义法。惠栋在训诂中重视语音的作用,使用读为、声转、同物同音等术语识字审音,并利用协韵解决句读、校勘、破读等问题。3. 两重证据法。惠栋在训诂中不仅广征博引历代传世文献(包括经文史传、注释文献、辞书字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还充分利用金石文字等出土文献作为佐证。这些都证明惠栋不愧是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进行训诂(运用“两重证据法”)的先驱。

五是展开横向比较。要公正地评价惠栋在训诂上的地位,必须比较吴、皖学派的代表人物惠栋、戴震两位在训诂上的同异。惠栋与戴震作为吴、皖两派的学术巨擘,二者关系是清代学术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然而,前人的关注点大多停留在二者的宏观思想层面,而对具体的训诂实践之间的同异却很少有人问津。书稿从戴震手校惠氏著作推断其关注惠氏之学说,从共同的治经取向推断其踵迹惠学之路径,进而阐明二者训诂之同;从归纳戴氏治《诗》特点为“信古求是”,归纳惠氏治《诗》特点为“信古求古”,进而突显二者训诂之异。另外,还进一步追寻了造成二者差异的原因:一乃地域文风濡染所致,一乃时代变迁影响所致。这种研究是以具体事实为依据,以严密论证为基础,故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

六是作出公允评价。本书的末尾,对惠栋训诂的成就与不足作了较为深入的阐述,指出:在清代学术史上,是惠栋首先祭起汉学的大旗,开创了独尊汉学的一代风气;惠栋用条目式的札记体撰写治经所得,这种札记体的训诂方式,实乃清人撰写新疏的端绪。惠栋在具体的训诂实践中,重视对词义的考辨,这种研究对词义的训释、辞书编纂都具有重要的价值。毋庸讳言,惠栋在训诂取向上确实存在“过于尊古、疏于考辨”等局限,在学术修养上又存在“疏于音韵学”等不足。这大概也是客观上造成学界

“扬戴抑惠”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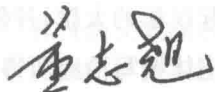
作出这样的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另外，慧真在书中，还结合惠栋训诂中涉及的14个词语进行了考辨，如《尚书·尧典》“庸违”当为共工名，而非用意邪僻之义。“謫赅”与謫諷、謫訝、訝謫、斥屻、睚眦、乍呼、咋呀、咤呀、咤叱、咤呼、咤咄、疥癩、齮齬等为同族词，有大声斥责、喧哗之义。并从语言文化角度考证了“庸违”为共工之名；从古文字角度考校了“侏饭不及一食”“贮积也”等。这就将训诂史的研究与自身的训诂实践紧密结合了起来，唯其如此，才能在训诂史研究中对前人的甘苦有切身的感受与体验，避免“看人挑担不吃力”而妄加褒贬。

总之，这是一项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为清代学术史、为训诂学史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也为弘扬江苏地方文化作出了贡献。

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就是对于惠栋训诂的家学传承虽有涉及但还不够深入；另外，还可以以吴派惠栋研究为基点，从吴门惠氏家族的训诂传承进一步拓展到江苏一地的家学文化研究。

衷心希望慧真以《惠栋训诂研究》一书的出版为契机，不忘初心，再接再厉，在学术史研究、地方文化史研究上再创佳绩。



戊戌元夕于

石头城下秦淮河畔

目 录

| | | |
|-----------------------|-----|-----|
| 序 言 | 董志翹 | 001 |
| 第一章 概 论 | | 001 |
| 第一节 惠栋家学概述 | | 001 |
| 第二节 惠栋研究现状及其不足 | | 008 |
| 第三节 本研究的相关问题 | | 021 |
| 第二章 惠栋训诂的家学渊源 | | 028 |
| 第一节 惠周惕的训诂传承 | | 029 |
| 第二节 惠士奇的训诂传承 | | 034 |
| 第三节 清代江苏训诂的家学传承 | | 041 |
| 第三章 惠栋著述考 | | 052 |
| 第一节 惠栋著述简明提要 | | 053 |
| 第二节 惠栋著述考辩 | | 077 |
| 第四章 惠栋训诂的内容 | | 088 |
| 第一节 考察旧注 | | 088 |
| 第二节 考释词句 | | 099 |
| 第三节 校勘文字 | | 114 |
| 第五章 惠栋训诂的方法 | | 121 |
| 第一节 训诂方法的层次性 | | 121 |
| 第二节 异文考证法 | | 132 |
| 第三节 因声求义法 | | 148 |

| | |
|---------------------|-----|
| 第四节 博征类比法····· | 156 |
| 第六章 惠栋训诂的比较研究····· | 173 |
| 第一节 惠栋与戴震训诂的比较····· | 173 |
| 第二节 惠栋学术群体训诂述论····· | 185 |
| 第三节 戴震学术群体训诂述论····· | 193 |
| 第七章 惠栋训诂的贡献与不足····· | 204 |
| 第一节 惠栋训诂的成就····· | 205 |
| 第二节 惠栋训诂的不足····· | 213 |
| 附录一 惠栋训诂商榷····· | 223 |
| 附录二 惠栋著作统计表····· | 254 |
| 参考文献····· | 265 |
| 后 记····· | 275 |

第一章 概 论

第一节 惠栋家学概述

惠栋(1697—1758),字定宇,号松崖,江苏苏州吴县东渚乡人,乾嘉学派中吴派经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清代著名训诂学家。惠氏生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卒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享年六十二岁。其先祖居陕西扶风县,远祖惠元佑迁居洛阳,靖康末以文林阁学士的身份随从宋高祖到临安,家居湖州。惠元佑生惠善。后来其家族分为四支,按曾祖兄弟的长幼排行次序曰四七、二一、三八、小一,三八那一支后代七传至惠伦,开始迁居吴县东渚乡。又五传至惠洪,惠洪活了105岁,号为百岁翁;惠洪生惠万方,万方生惠尔节(惠有声),尔节生惠周惕,周惕生惠士奇,士奇生惠栋。^①可见,东渚惠氏至惠栋已有十一代。东吴惠氏家族“四世传经,咸通古义”,第一代是有声,第二代为周惕,第三代为士奇,第四代为栋,其中又以周惕、士奇、栋祖孙三代最为著名,号称“东吴三惠”,他们开创了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吴派。

惠栋的祖父惠周惕(约1646—1695),字元龙,号砚(研)溪。为康熙辛未年(1691)进士,官至密云知县。“惠氏三世以经学著,周惕其创始者也”^②。惠周惕少传家学,官至密云知县,卒于

^① 此说参考江藩《汉学师承记》,三联书店,1998年,第25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经部,诗类二《诗说》提要,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3页。

任职期间。惠周惕为经学名家而兼擅文采，工诗和古文辞，有诗集《北征集》《崢嵘集》《东中集》《红豆集》《呖语集》《谪居集》等。惠周惕亦精于经学，有《易传》《诗说》《春秋问》《三礼说》等，今仅存《诗说》。

惠周惕一生以 1680 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红豆斋时期，二是宦游京师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他主要生活在江苏吴县东渚乡，与汪琬、徐枋、僧目存、潘耒等一起钻研经学、唱和诗文。汪琬比惠周惕年长 22 岁，顺治时期进士，曾担任户部主事、翰林院编修等职，后归故里，潜心治经，对《易》《书》《诗》《春秋》以及“三礼”均有研究。惠周惕为汪琬的入室弟子，有“十数年门墙洒扫之旧”^①，治学领域和治学方法深得其传，有《易传》二卷、《春秋问》五卷、《三礼问》六卷。惠周惕评汪氏的学术云：“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其旨皆以六经为归。搜择融液，与之大适，然后浸淫于《史》《汉》，反复于欧、曾，折衷乎紫阳，博取于吴临川、元清河、黄金华诸君子之文，因得通其变，穷其神，极其理趣而卓然自成一派，故其立言命意皆有所本，即一字一句，其根柢亦有所自来。”^②其实，这些评价汪琬的话，也是惠氏自己治学的宗旨。在这个时期，惠周惕还与徐枋、潘耒交往甚密。徐枋是著名的抗清英雄，入清不仕，致力于学术，有《通鉴纪事类聚》《廿一史文汇》等。其诗词长于叙事述史，感情真挚，情调激昂，惠周惕对之特别喜欢，并收集徐枋的诗文手札，表达对他的仰慕之情：“予之来京师也，搜集先生手书，装之以俱，往往秋风独夜，篝灯披览，若历历见先生于宜桥竹树之旁，与先君子对坐谈笑，且见次耕（潘耒）、超士执简操笔以进，而予兄弟亦若揖让进退于其左右之

① 惠周惕《书（尧锋文钞）后》，载《砚溪先生遗稿》卷下，清惠氏红豆斋抄本，北京图书馆藏。

② 同上。

间。”潘耒是徐枋的亲戚，也是著名的学者、政治家，一生最高的学术成就是在语音学领域，著有《类音》八卷。惠周惕与潘耒在青少年时期就在徐枋家认识了，他曾写诗记下了二者的交往：“关门雪尽日初和，幽事看看渐觉多。草绿细从微雨来，柳长轻被软风搓。同怀潘子朝堪往，好事侯生夜亦过。懒因春光醉何处？旗亭卢畔碧山坡。”^①

惠周惕受到师友的影响，另为才性郁结所促，1681年，他走出红豆斋，北上京师，开始了宦游生活。从1681年北上京师到1691年考上进士，有大约十年的时间往来于京城和故乡之间。在京城逗留期间，他结识了辅国将军博尔都、户部左侍郎田雯、礼部侍郎汤西厓等。博尔都为满洲人，著有《问亭诗稿》，曾袭封辅国将军。惠周惕曾写有《辅国将军博问亭见示春日送别诗慨然有怀次韵奉和六首》，这六首诗写春日里和博尔都游玩后分别的离愁，并表达了客居京城、思念家乡的思绪。田雯比惠周惕大11岁，曾任江南督学。惠周惕与田雯有长期的交往，田雯曾给周惕《诗说》一书写序，抒发了二人之间的深厚感情。惠周惕也写了《至德州饮山姜书屋》这首诗直抒两人的情义，如：“华阳亭边雨三日，刘智社前泥十尺。长鞭挝马马不行，矫首平原空叹息。田公知我将远来，青丝迎我城之隈。暖汤先与洗靴袜，更衣入座排尊罍。”

惠周惕晚年令人同情，他自负才气，秉性耿直，性情高洁，但直到康熙三十年（1691），将近45岁才考上进士，又经考选入翰林院深造，为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密云知县，但到任后一年即离世了。郑方坤（雍正元年即1723年进士）为其撰写的小传言：“昔刘须溪（宋刘辰翁）谓士方少时志科举，辛勤通古人，不知心

^① 惠周惕《书徐昭法先生手札后》，载《砚溪先生遗稿》卷下。

血之耗；及其得也，或陆沉州县，或流落边塞，坐念场屋，何心至此。今观砚溪之才，与其末路之所以蹭蹬者，追诵前言，可为雪涕。”^①

惠栋的父亲士奇(1671—1741)，字天牧，号半农，人称“红豆先生”。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少工文辞，盛年治经史，学问渊博，有《红豆斋诗文集》《易说》《礼说》《春秋说》《交食举隅》等著作传世。《惠氏宗谱》卷三有介绍：

公讳士奇，字仲孺，一字天牧，号半农，吴县人，周惕子。年十二能诗，及为诸生，益肆力于经史古学。康熙四十七年解元，明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庚子，主湖广乡试，旋奉命任广东学政。粤中现有士子鲜有通经，令诸生诵习五经、三礼、三传，能背诵背写者，即与录取，逾年渐多。会世宗登极，命再任，公益殚心造就，文风大振，为粤东历任学使冠。迁右中允，历升侍读学士。……赞曰：敦经说史，古人与稽，兴文峻峤，配食昌黎。

根据家谱的介绍可见，惠士奇少年时即表现出异于常人的聪颖，十二岁即写成“柳未成阴夕照多”的句子，大受乡人的赞赏。少年时发奋读书，早晚执卷不释，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亦能背诵。康熙四十七年(1708)，参加乡试得了第一名，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会试，结果以第十六殿试二甲考中进士，成翰林院庶吉士，后授予翰林院编修。

康熙五十九年(1720)秋，惠士奇被派往湖广主持乡试，该年冬天任命为广东学政。他一到广东即焚香设誓，昭示天下，不取

^① 钱仪吉编《碑传集》，文海出版社，1985年，第1293页。

分文，不徇私情，并颁行条令，鼓励通读经书。士子如果能够背诵五经，背写出“三礼”、《左传》者，由官府无偿供给膳食津贴，童子供给学生服。采取了提倡经学的种种措施后，广东当地原来崇尚空疏的文风和学风都为之一变，学子们专事经籍，争相诵读名篇。

惠士奇在广东任职三年，以清正廉洁驰誉岭南。当时科举考试场中，舞弊之风习见，而作为各省专司文教的最高长官学政，多随波逐流，少有清白之士。但惠士奇“校士公明，一文不取”，为世人称颂。两广总督杨琳曾向皇帝奏称：“臣遍历各省，所遇学臣中，仅见者有此清操特出之员。”鉴于惠士奇在广东的成就，雍正皇帝即位后命他留任三年，当地士子为之欢呼雀跃。留任以后，他打算在当地遴选一些经学领袖，使得当地的经学文化建设能够传承下去，曾举荐海阳进士翁廷资题补韶州府教授。这种思路和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因为他当时是学官，没有资格推荐官员，呈荐翁廷资后，被吏部因“学臣向无题补官员之例”否决，雍正皇帝特旨：“惠士奇所举，谅非徇私，着如所请，后不为例。”破例允其所请。

在广东任职期间，惠士奇乐于提携后进，教授当地士子不遗余力，他挑选了一批高才生为入室弟子。南海的何梦瑶、劳孝舆、吴世忠，顺德的罗天尺、苏珥、陈世和、陈海六，番禺的吴秋等成绩尤为突出，有名于时，被称为“惠门八子”。他还对当地的考试纪律大加整顿，曾一天处罚了十五个冒名顶替者，“粤人咸诧为神明”。在广东视学六年，深受当地人的爱戴，雍正四年（1726）他离任时“送行者如堵墙”。后来广东各地还把他配祀先贤祠，广州祀于三贤祠，惠州祀于东坡祠，潮州祀于昌黎祠。每逢元旦及其生日，当地士子都“肃衣冠入拜”，可见确实是深得民心。

回到京城后，惠士奇升任为右春坊右中允，掌管侍从礼仪，

后破格提拔为侍讲学士。据说雍正皇帝本来想让惠士奇任封疆大吏,但考察后发现他虽任职公明廉洁,但欠缺行政吏治之才,其特长在于司文墨。所以,最后召其进京专掌论撰文史之事。但天有不测风云,雍正五年(1727)五月,因其“入对不称旨”,被罚修镇江城,“即束装赴工所,弃产兴役”,但所修尚未到二十分之一就因资金不足而被迫停工,惠士奇也被罢官。乾隆皇帝继位后才又被重新起用,补翰林院侍读,乾隆三年(1738)以病告归,家居时清节自持,“不见长吏,不以书记干当事。子弟应试,虽故旧门生为主司同考者,不以一言属也”,三年后病逝,终年七十一岁。

惠栋能够成为一代训诂学家,实为家学累世相传的积累。其生于这种书香门第,从小浸染其间,加上本人生性“凝静敦朴,好学不倦”^①,从小便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功底。王昶的《惠先生墓志铭》写道:“承其家学,于经史诸子、稗官野史及七经缙纬之学,靡不肄业及之,经取注疏,史兼裴、张、小司马、颜籀、章怀之注,诸子若庄、列、荀、吕览、淮南,古注亦并及焉,而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余及《急就章》《经典释文》、汉魏碑碣,自《玉篇》《广韵》而下勿论也。”^②良好的家庭熏陶,坚实的治学基础,广泛的学术积累,使其在很小便展露出异于常人的才智,二十二岁即写成《春秋左传补注》一书。惠栋少年时期是在平静的读书生活中度过的。

康熙五十九年(1720),惠士奇出任广东学政,惠栋随父前往,在粤数年,与时称“惠门四子”的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六谈经论艺,成为莫逆之交。雍正五年(1727)惠士奇因“奏对不称旨,罚修镇江城,用罄其家”^③。自此以后,惠栋的生活亦发生

① 王昶《惠先生墓志铭》,载钱仪吉编《碑传集》,第6330页。

② 王云五、吴曾祺主编《涵芬楼古今文钞简编》(十五),商务印书馆,1910年,第102页。

③ 同上。